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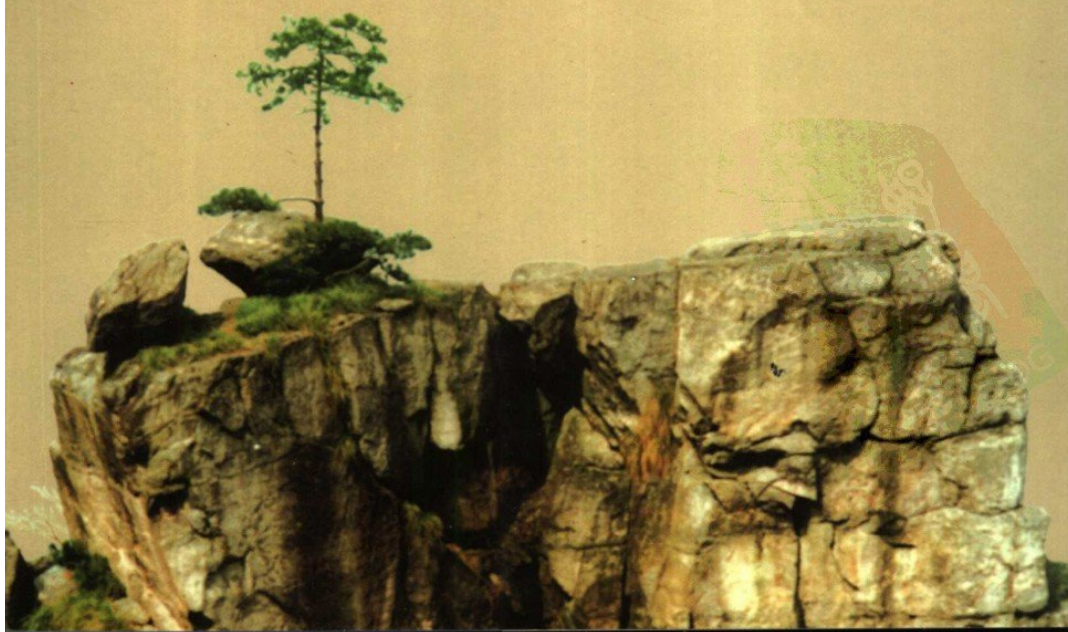
政治沧桑六十年

冷石斋忆旧



兰州大学出版社

吴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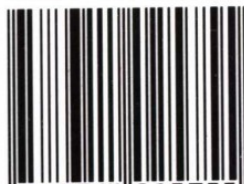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克非
封面设计 / 张稳移
高燕平



冷石斋忆旧

ISBN 7-311-02575-3



9 787311 025755 >

ISBN7-311-02575-3/K·326 定价：25.00元

政治沧桑六十年

冷石斋忆旧

吴江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吴江著. —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 2005.5
ISBN 7-311-02575-3

I. 政... II. 吴... III. 吴江—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921 号

政治沧桑六十年
——冷石斋忆旧

吴 江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12.75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2

字数:25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575-3/K.326

定价:25.00 元



作者（摄于冷石斋）



作者青年时代的启蒙读物



作者与夫人邱晴1949年进北京时留影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一家人分别下放离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各自请假回京首次全家团聚（1974年春节于北京）



作者两孙儿（2002年留影）



作者1991年最后一次返乡，摄于故居前。
小山村破败依旧。

作者和本书内容简介

吴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浙江诸暨人，1918年2月出生。1937年起参加社会活动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实际工作之余开始理论研究和业余写作。主要著作有：《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哲学专题二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民主与政党》（与牛旭光合写）、《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文史杂论》、《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冷石斋沉思录》、《吴江论集》等。

以上多为作者离休以后所写，因此内容多属于对20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重新认识。

本书是作者自述从1937年参加工作到1990年离开工作岗位这六十多年岁月中的主要经历，也可以说是自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史实的私家记述。作者

在本书中边叙事边议论，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一些史实，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个人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都全面，但有些也足以成一家之言。作者对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史实着墨较多，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从作者已出版的书籍（如《吴江论集》等）中移植过来或加以改写而成，因为这些是作者重要经历的一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作者作了特殊处理，即除记述运动酝酿过程外，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则不叙不评，而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一部分旧体诗词表达当时的境遇、看法、心情及感慨（作者说这是他初写旧体诗词的习作），可称别具一格。

序

继《吴江论集》之后，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又将出版。吴江同志嘱序于我，因得先睹为快。我跟他的忘年交始自谈诗，那时他已从“中心”转入“边缘”。我独喜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虽经几十年政治风浪而仍不失读书人的本色。从他的自述，知道早从20世纪50年代，他就希望由“从政”转向“从学”，因为他自1937年参加共产党，在多年的党内生活和党内斗争中，对“政治”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从而发现自己的气质不适于从事实际政治；虽然，他也知道，“在党内‘从学’和‘从政’仍然是相通的，这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之意”。所以，他是直到1990年离休以后，才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就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

吴江从少年时代自发追求新社会理想（首先看重农民问题），青年时代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他对待革命，对待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真诚的。然而，纵然他有志于学，但在40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条件下，他所能学的“理论”，他所能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很难

越雷池一步；也只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能戴着枷锁走出来，并一步步获得思想的解放。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前言中，恳切地写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逐步解放的历程，他说，1977年到1987年这又一个十年，是对过去年代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进行反思并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也是对社会主义自身进行改革的初始阶段；这不是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旧东西简单地恢复，而是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严格的自我批判（改革即自我批判）。“这场斗争总的可以说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积累起来的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总清算。”吴江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忧伤和痛苦塞满心头，“到后期，忽然有些悟性，用思渐宽阔，觉得我们党就其为自己确定的理想和任务来说，固然堪称伟大，但行动并非一贯正确。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从此，我开始动起自己的脑筋来，力求对每一项行动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这种思想逐渐明确起来，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在改革由局部向全面推进、拨乱反正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经过多种性质的斗争（坚持极‘左’与反对极‘左’，改革与保守，制度变革的尝试，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新领导人的上台下台，等等），而逐渐达到的。”吴江说，“思想达到这一步，我开始觉得对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对社会主义也好，对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如此。“重新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

“‘重新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说得真好。一个渴求接近真理的理论工作者，一个不改献身于民族自由和社会解放事业初衷的革命者，一个正直的老共产党人，一个保持着读书人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从这里开始探索。这一探索，得到中共党内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的支持。他与少数同志一起，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冒着风险突破了不止一个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的禁区。

大体说来，在1977到1987这十年中，吴江这个素不习于官场潜规则的一介书生，从理论工作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核心斗争；而从1990年离休之后，他才真正做到他在80年代即已意识到的“理论工作应与当前的政治、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政治、政策的随意性实在太大了）”，他把“为学”和“议政”结合起来，提出一些发人所未发的创见，接受科学和理性的审查，接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他在这十几年里获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收入《吴江论集》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篇”、“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篇”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篇”等部分的若干论文（单行本则有《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等）。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出版时，我曾以《吴江老矣，犹著新书》为题，撰文记述他的一些思想，老年著书，自然多记史、反思、重识前言往行之作。现在将我记述的摘录几段在下面：

我想用“空谷足音”来形容吴江新书和我读后的感觉，这本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二次印刷），主要收入了他十年来有关的论著和答问（书中同时收入写于80年代的几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研究最早是针对1983年一份有关领导部门发布的宣传我国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时期、以此制造理论和政策混乱的“研究提纲”的）。难得的，也是在国内久已不见的，是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它原有的理论体系及其宣传、阐释和实践）时表现的自由精神。吴江数十年来一直进行理论研究，如他所说，“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而在这里他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

在一般人看来，《共产党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却启示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行动上更不能墨守照搬。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时，突出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吴江据此说，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基本思想”集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上。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表现在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若连说话的自由权利也没有，甚至连思想自由的权利

也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了。“这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恩格斯 1889 年 12 月 28 日致格尔桑·特利尔信中，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在自己队伍中不能消灭言论自由，“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吴江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部分，恰恰告诉我们，俄国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显得生气勃勃，人才辈出；革命成功以后，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突出，注释经典风气很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执政党员，实际上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充分自由。吴江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和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此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评的勇气，只以观察政治风向、揣摩领导意图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上有所云，然后下笔，迎合为尚，鲜知节操，则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实用主义或御前工具，只有实用政治价值可估，毫无理论价值可言”。

共产主义，这无疑是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们中间不容亵渎的话题。吴江作为“最讲认真”的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作时的历史真实。在

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社会主义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提倡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那时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因此他们避免用“社会主义”一词，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予以批评，而采用“共产主义”的提法，《共产党宣言》实际是《共产主义宣言》。但是到了1894年2月恩格斯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了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所谓三十年不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吴江认为或指从1864年组织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时起一般已不再沿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名称。）”

这是怎么回事呢？吴江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继承了某些空想成分。现在应当说：“从空想到科学”仍然是一个过程，它要由历史来完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部分，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称赞它难以超越；然而在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方面，在提出具体的改造方针方面，其论述往往表现出过多的“理想”成分，不少属于假设和推理性质，有待于实践来检验，其中包括证伪（例如恩格斯说他们对于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错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重新进行冷静的观察，他们察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很快到来，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中又难的事，共产主

义完全要听命于实践，由未来的实践去探索。他们劝告青年人切不可轻言共产主义，更不可轻率地为共产主义预先设计什么。他们自称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的预先设计师，也希望别人不要充当这类设计师。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理想时，又往往忘记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想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这句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话；也忘记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中又难的事，切莫采取冒进行动的警告，而念念不忘尽快将共产主义理想变成现实，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以致出现变理想为空想的严重教训。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普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只是在经历了几次重大挫折之后，也终于认识到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发展出来共产主义”，并再三提醒人们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由此可以推知这时列宁已改变了他原来那个“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看法，开始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区别开来，而和恩格斯1894年的看法达到一致。

吴江说，“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通病，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并有自己的理论。通常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左”始于50年代后